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当代鲁迅问题评论

——
陈安湖自选集

陈安湖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当代鲁迅问题评论

——
陈安湖自选集

陈安湖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鲁迅问题评论——陈安湖自选集/陈安湖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4702-9

I. ①当… II. ①陈…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文集②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I210.97-53②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474 号

当代鲁迅问题评论

——陈安湖自选集

© 陈安湖 著

责任编辑:张建英

责任校对:罗 艺

封面设计:新视点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 press.com>

电子信箱:hschs@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96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7

版次: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 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论《狂人日记》的思想(1954年)	(1)
《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1961年)	(14)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1978年)	(27)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1979年)	(39)
说《雪》(1979年)	(73)
论《伤逝》(1981年)	(81)
关于《雪》的论辩(1983年)	(100)
鲁迅小说“新研究系统”商讨(1987年)	(110)
写在王富仁同志的答辩之后(1987年)	(133)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1988年)	(146)
《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的批判(1990年)	(156)
论袁良骏鲁迅思想研究中的问题(1993年)	(170)
辱骂——人格的自我失落(1993年)	(187)
附：李蕤致陈安湖(1993年)	(191)
关于“鲁迅研究的新路向”(1994年)	(193)
论鲁迅早期的个性解放思想(1997年)	(202)
论鲁迅早期的民主思想(2000年)	(218)
《野草》研究的历史回顾与问题商讨(2009年)	(230)

附 录

陈安湖《鲁迅研究三十年集》序(李何林)(1983年)	(257)
《鲁迅研究三十年集》后记(1987年)	(260)
《为鲁迅声辩》自序(2000年)	(263)

论《狂人日记》的思想^[1]

关于《狂人日记》的思想性质问题，过去曾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发生过一些争论。下面我们想就争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

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狂人日记》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写成的，其中已渗透着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抱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很多，但在《狂人日记》的研究中却很有些影响。另外有些同志，虽然没有作出这种明确的论断，就是说，并不认为鲁迅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但认为他实际上已运用这种学说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思想了。所以在他们看来，《狂人日记》始终贯串着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作者也分明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群众一边，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反对吃人者。例如，曾有人这样说：

《狂人日记》突出的意义，就在它是从阶级对立的关系中，剖析了中国的旧社会。它把旧社会明确地划成两大阶层：吃人者与被吃者，也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鲁迅先生是火热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2]

这种观点是相当普遍的。这位研究者虽然未必认为鲁迅当时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实际上认为鲁迅的立场和分析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就是说，鲁迅实际上是运用它来观察和分析封建社会的吃人现象了。所以在他看来，小说中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即为封建社会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鲁迅已经明确地指出这种吃人者和被吃者的阶级对立关系，并且宣布他站在被吃者一边，反对吃人者了。这种说法，过去确曾为一部分读者所信从；因为鲁迅的确是痛恨吃人者，也很同情封建社会里被吃的弱小者的。然而如果我们把《狂人日记》仔细研究一下，好像问题又没有这样简单。《狂人日记》里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那界限有时似乎非常不容易分清楚；当然，界限是有的，但似乎又不是什么阶级，而是别的一种什么东西。自然，这里必须进行一点比较具体的分析。

人们都知道，鲁迅作《狂人日记》时期的思想，还是五四运动前的思

想，正如瞿秋白所说，“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3]。鲁迅当时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未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对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的社会力量的看法，都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从进化论看来，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经历着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的过程，所以人类的后一代必胜于先一代，子女必胜于父母，青年必胜于老人，这是“物竞天择，自然淘汰”的必然规律。鲁迅当时从这些观点出发，认为中国的社会，和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在人类进化的长途上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已经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不能适应现代的潮流，成了中国人民进步的根本障碍；如果我们不彻底扫除这些东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物竞天择”的竞争中必然失败，甚至最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4]，陷入被消灭的绝境；所以他非常痛心疾首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愚昧，无时不攻击封建宗法制度，攻击旧礼教、旧传统以及其他一切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他当时的许多著作，大抵集中在对这些东西的揭发和批判方面，其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叫人警惕自然淘汰，主张生存竞争的意思”^[5]。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进化论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这一篇《狂人日记》。鲁迅在里面引用了尼采的话，认为人类是由虫豸猴子进化来的^[6]。在野蛮时代，人类没有开化，在进化长途上处于低级的阶段，人吃人的现象很普遍，所以小说里说：“当初的野蛮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人类逐渐进化了，文明了，大家都认识到吃人是野蛮行为是丑恶的、可鄙的，所以吃人的事也就逐渐减少。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个道理，有些人认识了，不吃人了；有些人没有认识，却还在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由此可见，在作者心目中，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分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一种是已经进化了的不吃人的文明人，一种是还停留在低级阶段的吃人的野蛮人。当时，作者把中国的封建礼教、封建道德都看做是一种野蛮落后的吃人的东西，而一切拥护这些礼教道德，反对社会改革，反对进步的人也就是吃人的人。在《狂人日记》中，这种人以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等为代表，站出来迫害狂人。狂人正和他们相反，在作者心目中，狂人是封建社会中认识了宗法制度（包括家族制度）的野蛮落后而觉醒了的人，他怀抱一种和封建宗法制度绝不相容的新思想，对各种吃人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有极深的憎恶，坚决地、毫不妥协地要推翻它。这两种人在《狂人日记》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小说的主题就是在这斗争中展开和完成的。一边是拥护封建吃人制度，一边是反对封建吃人制度，这两种人才是《狂人日记》中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也是作者当时心目中的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

在小说中，作者还提到一种“真的人”。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一种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人类，是世界上最崇高圆满的人类。鲁迅认为在人类“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这样一种崭新的人类，作为未来世界的主宰。他在《热风》中说：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7]

这是作者当时所理想的人类。作者把希望寄托在这类人身上，并拿他作为中华民族改革的目标，用以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作者心目中，这种人和狂人一样，都是反对野蛮落后，反对封建的吃人制度和思想的，他们不是属于封建营垒，而是属于反封建营垒，属于新世界、新社会的人。

所以，所谓吃人和反对吃人的两种人，在《狂人日记》中，并不是指封建社会内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是指一切拥护封建制度的人（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人（包括“真的人”在内），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

自然，在封建营垒内，即在思想上拥护（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人们（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直至佃户、女人和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中间，也常常分为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但作者当时并不认为封建社会内的吃人和被吃，以阶级的不同而划出一条界限，就是说，并没有清楚地分出哪一个阶级是专门吃人的人，哪一个阶级是专门被吃的人；因为，在当时的作者看来，凡是拥护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的人，凡是反对新思想，死也不肯改革、不准改革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迫害革新者，因而都在有意无意地吃人。他们不但要吃狂人，同伙之间也会自吃；他们之间强者可以吃弱者，弱者可以吃更弱者，这样的互相吃，互相残杀。所以小说中说：“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自然，所谓强弱，也多半由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的不同造成的，被吃掉的人，常常也是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人，也就是广大被统治阶级。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上的奴役，许多属于被统治阶级的人愚昧、没有文化、缺乏应有的觉悟，所以他们——正如《狂人日记》所揭示的，也盲目地跟着统治阶级去反对改革者，反对狂人，把他看成洪水猛兽，一面怕他，一面又想谋害他。他们因为没有地位，没有权利，常常被统治者吃掉，但一有机会，他们又要去吃那些比他们更弱、更无地位的人。作者在《灯下漫笔》^[8]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揭露了中国千百年来封建社会的这种可悲的历史：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封建制度分人为十等，地位最低、最受凌虐的是所谓“台”。看来，“台”除了接受别人凌虐之外，再也无人供他凌虐了。然而这是“无须担心的”，作者指出，“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作者说：“因为古代传下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更可悲的是，在《狂人日记》中，不但女人，就是小孩子也受了吃人思想的传染，跟着赵贵翁之类的统治阶级来反对狂人。如第二节里说：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作者明确指出，这些小孩子所以变成狂人的敌人，是“他们娘老子教的”。由此可见，反对狂人的人，包括了从封建统治阶级直到一般群众以至于无知无识的小孩子。其中并没有以阶级来划分界限。作者这样描写的目的主要是要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罪恶，促使人们觉悟，奋起推翻它的黑暗统治。

这当然并不是说，鲁迅当时一点也没有看到封建社会的“阶级对立的现象”。鲁迅虽然还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去观察社会，但他究竟是生活在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社会里，而且“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9]鲁迅前期的作品，也非常明显地表现了对压迫者的强烈憎恶和对被压迫者的深厚同情。社会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现象，他无疑是看到的，感到的，这在《狂人日记》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但问题在于，鲁迅还不知道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去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他还没有明确地指出（像我们许多马

克思主义者所做过的那样)，人吃人的现象，是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结果，因此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首先消灭阶级。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所反映的，主要的（我是说主要的）并不是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封建和反封建、拥护封建传统和反对封建传统之间的斗争。作为狂人的反对者而出现的有封建统治阶级，也有被统治阶级。如第三节里写道：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可见，鲁迅虽然也看见了“阶级对立的现象”，而且看见了农民阶级和其他下层人民所身受的悲苦，同情这些悲苦；但他认为这些群众由于愚昧无知，常常也极容易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变成他们的驯良的臣民，在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中，站到统治阶级一边，去反对一切的社会改革者。

瞿秋白说：“在当时的中国，城市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巨大的自觉的政治力量，而农村的农民群众只有自发的不自觉的反抗斗争。大部分的市侩和守旧的庸众，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确是改革进取的阻碍。”^[10]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要批评的，就是被统治阶级中那些“替统治阶级保守着奴才主义”的无知群众。他当时是把他们归到反对狂人的阵营，即拥护封建制度的阵营里去的，并不因为他们阶级不同而把他们从反对狂人的阵营分离出来。因为，正如鲁迅自己说的，他的《狂人日记》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1]，而不是暴露阶级对立的“弊害”，虽然以鲁迅的深刻的观察和天才的敏感，也反映了一些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

鲁迅把封建制度看做是吃人现象的总根源，也是中华民族落后的总根源，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它；同时，也希望拥护封建制度的人觉悟过来，彻底改弦易辙，洗心革面，以免被“真的人”所除灭。所以他借了狂人的嘴对人们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的人，活在世上。

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这些话里面充满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于民族前途的无限焦虑。如果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的人，纯指封建统治阶级，这些话应该怎样解释呢？这里很容易把人引入迷途。因为鲁迅这些话，就是对那些吃人的人说的，他希望他们去掉吃人的思想，真正改好，以免被“真的人”所除灭。这是鲁迅在热心地为统治阶级的命运着想吗？是企图挽救他们没落的命运，使他们得以永远生存下去吗？不是的。鲁迅这些话，是对包括被压迫阶级在内的整个民族说的，他固然非常痛恨他们守旧，不肯改革，但也深爱他们；正因为爱他们，他才担心他们的命运，才为他们的落后而痛苦，才焦思苦虑地为他们寻找出路，希望他们改好，在世界上争得自己的地位，跟着别的文明民族一同前进。

由此可见，把《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吃人和被吃的两种人，简单地、机械地理解为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乃是一个错误。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流露出来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性质问题，也是过去人们谈论较多的问题。徐中玉同志在《〈狂人日记〉研究》^[12]中断定：《狂人日记》已经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发”。他说：

在鲁迅，固然在他后期的创造活动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是表现得更加明显，但就在他前期的作品中，甚至如上所说，就在他的第一篇小说——这篇《狂人日记》中，也已相当清楚的能够看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基本方向（因素）的最初萌芽。

另外，在上面提到的《鲁迅作品的分析》第一卷中，朱彤同志根据《热风》中的《圣武》一篇，也认定鲁迅在五四前，就已经“以激动的心情”“欢呼着苏联的革命”了，所以“在鲁迅先生思想里，共产主义的种子早就萌了芽”。接着朱彤同志又以《狂人日记》和《圣武》写于同年（实际不同年）为理由，断定《狂人日记》“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这篇小说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或者至少已经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了。

还有，蔡仪同志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一书中也有相似的意见。他说：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来说，他在最后呐喊着要“救救孩子”，要

我们的后代不被人吃也不吃人，不被人压迫也不压迫人，不被人剥削也不剥削人，这不是要建设无阶级的、无私有财产制度的人类理想的社会吗？这在鲁迅当时的观念也许是模糊的；即算模糊，然而这正是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

应当说，这些研究者大都是出于好意地为鲁迅的伟大找证据；但我们也应该知道，对鲁迅的真正歌颂，必须建立在对他的作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推论上。

蔡仪同志所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主要的理由，就是其中已经表现出“要建设无阶级的、无私有财产制度的人类理想社会”。这正是前面提到的某些研究者立论的根据。其实，谁都知道，所谓“要建设无阶级的、无私有财产制度的人类理想的社会”，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可以出自各种不同的阶级思想，倒未必一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例如我们的古圣先贤，也有梦想大同社会的，但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断定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始祖。而且，大家都知道，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也都是希望建立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的，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并没有到达真正科学的地步，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着本质的区别。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表现出的对未来的认识还是朦胧的，他寄希望于将来，寄希望于孩子，就其本质说来，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

《狂人日记》中曾经提到“将来”，也提到一种所谓“真的人”。如上所说这“真的人”是鲁迅作为理想的人类而提出来的。但所谓“真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所组成的是怎样的社会，人们将在怎样一种政治形式和经济形式中过活，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又怎样，鲁迅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是真正明确的。一九三四年，他在《答国际文学社问》^[13]中说：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

可见，鲁迅自己承认他当年对要建立怎样的新社会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含含糊糊地说一句他“要建设无阶级的、无私有财产制度的人类理想的社会”，自然也没有什么大错，但对我们理解《狂人日记》的思想实质并没有多大帮助，更不能单凭这一点就决定《狂人日记》已经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

不过，认识这一点是重要的，就是，鲁迅当时的社会理想虽然有着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想的性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是进步的、革命的。人们可以从这种社会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对照中，清楚地看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野蛮和不合理，看出中国民族落后和贫弱的状态，因而更坚定了人们推翻封建制度的决心。所以鲁迅这种对于将来社会的理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是非常值得珍视的。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引过一位革命导师的话，说明鲁迅当时的社会理想的进步意义，说：

吃人经济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要产生反对这样制度的理想，在被剥削的群众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谓知识阶层的个别代表之中也是如此。这些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宝贵的。

可见，我们不能忽视和低估了鲁迅当时社会理想的进步意义。

那么，鲁迅当时是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力量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如果我们认为《狂人日记》里已经有了“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那无疑地是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当时鲁迅还不很了解工人阶级，不知道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相反，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对工农群众的革命性和他们的力量，多少有些忽视和怀疑。他当时根据进化论的道理，认为社会是将来胜于现在，青年胜于老人；所以将改革中国的希望和责任完全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当时在青年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极力提高他们的觉悟，鼓起他们的战斗热情，原因也就在这里。例如他在《华盖集》的《题记》中说：

我早就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憚地加以批评，因此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在《坟》的《灯下漫笔》中，他把中国的历史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认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在《忽然想到之十》中又说：

……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数倍于别国的青年……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的事情留下，都

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

由此可见，鲁迅当时认为在全民族的各种成员之中，唯有青年能够负担起挽救国家、改革社会的责任；他所看重的、计算在内的力量，主要是青年的力量。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的希望既不是寄托在民族的腐朽力量——封建统治阶级身上，也不是寄托在被封建统治阶级所迫害的人们身上，也不是寄托在女人和母亲身上，而是寄托在小孩们新一代身上。所以，当狂人看见小孩子也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害，跟着赵贵翁之类反对他的时候，他就感到纳罕而且伤心；最后又发出要“救救孩子”的呼声。作者在《热风》中说：“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14] 孩子是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现在和将来改革社会的新生力量。失去孩子，也就是失去了中国的将来；救救孩子，也就是救救中国的将来。鲁迅当时号召来一个彻底的思想革命，推翻黑暗的封建制度，粉碎一切封建桎梏，也就是要把新一代从封建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使他们个个都有新的思想精神，跟上时代的潮流，建设幸福合理的的生活。

鲁迅在社会改革中，不依靠别的社会力量，而依靠青年，依靠新一代，这是他的进化论思想所决定的。鲁迅当时还不知道应当依靠无产阶级，因为他还没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一个唯一的彻底革命的阶级，没认识到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的道理。依靠青年，依靠新一代，在当时也是一个革命的主张，但这并非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的。

然而，鲁迅当时又打算从哪里开始来改革中国呢？换句话说，改革中国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呢？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在五四前……热烈的希望青年，他勇猛的袭击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所谓“要求个性的解放”，也就是要把封建思想彻底扫除，让人民的思想精神得以自由发展，以此来促进中国国民性的改造。这是鲁迅当时用以改革中国社会的入手的办法。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曾批判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庸俗的唯物论的论调，明确提出他的改革社会必先改革国民性的主张。他说：“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

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这就是说，“尊个性而张精神”是立国的首要任务，没有它，国家就要“槁丧”，而且“不俟夫一世”。在《文化偏至论》的另一个地方，他还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由此可见，鲁迅当时认为个性解放，是“沙聚之邦”转为“人国”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改革社会，不是从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开始，而是从“尊个性而张精神”开始。鲁迅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并非别的，而是因为大家都不肯改造自己的劣根性，把国家弄得坏而又坏，遂成为现在的情形，所以他觉得“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5]。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深刻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度的吃人历史，并通过狂人的口，热心地给那些拥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人宣传反对人吃人的进步思想，要他们彻底改掉吃人的野蛮思想和习俗，其目的，也就为了改造国民性，希望把人性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们都有革命的思想精神。小说最后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也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的新一代都不沾染封建的野蛮吃人思想，能够健康地成长，合理地做人。可以说，争取个性解放，改造国民性，是《狂人日记》的基本思想，和鲁迅当时的其他著作，在主张上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争取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又应该从哪里做起呢？是从集体到个人，还是从个人到集体呢？鲁迅当时的回答是后者。他认为个性解放，应当从每一个家庭做起，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做起；因为他认为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不先来解放它、改革它，改革中国就只是空谈。1919年，他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6]一文，就是专门讨论改革中国的家庭关系的。他主张一家之中，“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并且说“这是极伟大的要紧事”。在《狂人日记》中，也有意思相近的话：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大哥”在《狂人日记》中是一个家长，也就是封建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这里明显地透露出鲁迅当时所主张的改革社会的方法，即先解放个人，解放家庭，而后才是解放集体，解放全社会。这种观点和他的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是分不开的，和他当时思想中的某些唯心历史观的因素也是分不开

的。自然，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讲，鲁迅的主张，也有着它的显著的进步意义。

瞿秋白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肯定鲁迅个性解放和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革命意义，这是十分正确的。鲁迅的主张，现在看来不管有着怎样的缺陷，但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他比那些庸俗的唯物质论者（如洋务派之类）看得更深更远。他看到了人民群众觉悟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社会的文明，并不决定于“钩爪锯牙”，而决定于人民群众思想精神的革命化。这表明鲁迅当时具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不愧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伟大先驱者。

然而，鲁迅这些主张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思想的范畴？是否如某些评论者所断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呢？我想也不是的。从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先解放个人而后解放集体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如瞿秋白所说，不过是“资产阶级性的幻想”而已。斯大林说过，马克思主义“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17]由此可见，鲁迅的主张，虽然在当时不失为革命的主张，但还不能说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它和后者还有不同的阶级性质，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所以，单凭“要建设无阶级的、无私有财产制度的人类理想的社会”这个抽象的信念，不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就贸然肯定《狂人日记》已经有“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映”，是不对的，也是不可信的。

然而，如果说，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以及当时别的一些著作中所流露出来的改革社会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范畴，那么，他和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什么区别呢？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认识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在五四运动统一战线中的特殊性，也不会了解为什么胡适等人不久就开倒车，投降反动阵营，而鲁迅先生却独能“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18]，以至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鲁迅当时的思想虽然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也有他自己在斗争中发展了的东西。他并不是改良主义者，而是坚决的、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切传统，并无半点留恋，也不存有什么幻想。他认为，封建制度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彻底推翻它，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反对在斗争中的妥协和动摇；并且时时警惕着封建主义者改头换面，以少许的让步来缓和反封建的斗争，使他们能够苟延下去的阴谋。这种坚决的、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也贯串着整个《狂人日记》。

狂人对于一切吃人者的揭露和打击是尖锐而不留余地的。无论对赵贵翁、古久先生或大哥，他都不存有半点妥协的、改良主义的幻想。小说从头到尾都贯串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这就是鲁迅精神，就是他常常所说的韧性的战斗。这种彻底的战斗精神，在当时，不要说胡适等人，就是在一些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鲁迅当时的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进化论思想。其实，他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就不是进化论思想所能包括的。在鲁迅早期的世界观里，有着很明显的唯心论的成分，但由于他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长期的研究，也由于他对自然科学有着很好的素养，在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中，也有着唯物论的成分。1907年所写的《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有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是很相近的。而且，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他始终是面对现实，坚持着战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的消极一面的揭露和批判，无论就发掘的深度，还是就态度的彻底来讲，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进化论者所能达到的。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第一次给我们解剖了封建社会，深刻地指出了在“仁义道德”的幌子下封建制度吃人的真面目。当时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深刻剖析，很少人能够达到鲁迅那样的深度。他思想的某些方面还由于受到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范围，而且他对封建制度的许多结论，就现在看来也是十分正确的。1952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的社论曾经扼要地总结了鲁迅前后期对旧中国历史文化的观点，说：

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观点，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就思想讲，就战斗精神讲，鲁迅当时都不是单纯的进化论者。我们说鲁迅早期基本上是进化论者，也就是意味着他还有其他的思想成分。鲁迅当时的这些为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所没有的思想因素，就是他的思想精神在当时的特殊性，也就是他后来发展为共产主义者的基础。忽视这一点，把鲁迅看做单纯是进化论者，无疑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脱离实际，过于夸张，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有共产主义思想，也是不合事实的、错误的。

1954年11月作